

石刻精华版

河东 水利石刻

张学会 / 主编

禹公篇

德政篇

河水篇

泉湖篇

井池篇

堤桥篇

水规篇

争讼篇



山西人民出版社

石刻精华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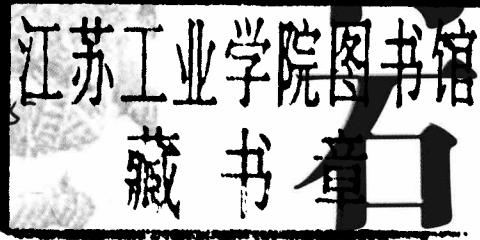
张学会／主编

河东水利 石刻

谨以此书
献给黄河古文明的直根—河东大地
献给勤劳勇敢智慧的运城人民

崔建华同志指正

2004.12.15
吴钩



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东水利石刻/张学会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8

ISBN 7 - 203 - 05110 - 2

I . 河... II . 张... III . ①黄河 - 水利史 - 运城地区 ②石刻 - 简介 -
运城地区 IV . ①TV882.1②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5171 号

河东水利石刻

主 编: 张学会

网 址: 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 冯 潞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邮 编: 030012

印 张: 23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字 数: 360 千字

0351 - 4956036 (综合办)

印 数: 1—3500 册

E - mail: Fzxz@sxskcb.com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Web@sxskcb.com (信息室)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gujshb@sxskcb.com (综合办)

定 价: 88.00 元

——谨以此

献给黄河华夏文明的直根——运城大地

献给世世代代治水不辍的古今河东人

《河东水利石刻》编委会

顾 问 孟福贵 安德天

主 任 张学会

委 员 卫庆虎 袁恒太 张志铭

 王培道 马永枝 郭兆平

 吴 钧 张钦桂 王梦群

主 编 张学会

执行主编 张志铭

副 主 编 吴 钧 张钦桂 王梦群

编纂人员 令狐正 杨文斌



凡 例

一、本书辑录古河东(今运城市)境内 13 区、市、县有关水利方面的石刻, 经过筛选、整理、编辑而成。故定名为“河东水利石刻”。

二、本书共收集河东水利石刻 200 通, 其中存碑 131 通, 佚碑 69 通。按其内容分为禹功篇、德政篇、河水篇、泉湖篇、井池篇、堤桥篇、水规篇、争讼篇、灾异篇、鹾海篇、祷雨篇。

三、为保持碑刻之原貌, 对每通碑文均按拓本眷录, 佚碑则注其出处。对其中施银化缘人名及银数等, 一般从略。

四、碑名取碑文首行碑题或碑额。如碑名文字过长者则从简; 无碑题无额题或剥泐不清者, 按其内容拟名, 并以“*”号注明, 以示区别。

五、对碑文中的繁体、异体字, 均改为规范的简化字, 对个别查找无着者的生僻字, 则按原字照录。

六、对碑文中文字漫漶剥泐不清难以辨识者, 均以“□”代之, 缺字过多无法计数者, 则以“阙”字代之。

七、碑文中的干支纪年、帝王年号均照录, 并换算为公元纪年, 注于括号之内。

八、本书所录石刻断限, 上起汉代, 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跨度近两千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立之水利石刻, 除个别有特殊价值予以选录外, 余皆不录。

九、在每通碑前, 对碑之形制、规格、书体、额、座及存放地点、立石年代均予以介绍。



凡 例

十、对碑中难以辨认的词、字作简要注释，有的还附有题识，个别碑文深奥难懂者，附译白话文。

十一、为增强读者阅读及观赏效果，书中附有部分碑刻拓照，力求图文并茂。

十二、卷末，附录部分未收录的水利碑目，以供来者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之参考。



概 述

水，万物生命之源。古称水为五行之首。《易》称天一以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云：“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管子》曰：“水也，地之气也，如筋脉之通流者。”古之学者给水以深刻而精辟的定论。

鉴于水在人类生活、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历代诸多学者对水的考察、研究十分重视。早在汉代，桑钦著有《水经》一书，其中记载我国河流、水道 137 条。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他以《水经》为纲，其注二十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记载河流、水道 1252 条，并一一穷源究委，广征博引，引述文献资料 470 余种，采录碑刻资料多达 350 余处。在时间上，上起秦汉，下至北魏；在地域上，包罗全国，涉及境外；在内容上，括及河川、山岳、水利、水陆、交通、城邑、郡县、古迹、人物、祠庙、陵墓、经籍等十二类。其记述之详，涉猎之广，集前人之大成，成为我国水方面的一部不朽名著。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中，关于水的记载更为详尽。凡省、府、州、县的志书，大都设有关于水的篇章，其内容涉及到山川、河流、泉湖、渠堰、津渡、桥梁、水源、流向及流经之地域等，且在《艺文》中收录有关于水的考证及用水制度、水权争讼等论述，其虽非名著大作，但在浩瀚的史籍中却难索得。这是先辈们辛勤劳动的结晶，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文化财富，为我们今天研究探索历代水利的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我们应该倍加重视。



(一)

河东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 180 万年前，芮城县西侯度旧石器时代早更新世遗址中，曾出土人工打制的石核、砍斫器、刮削器和烧骨节，这些实物表明当时这里已有人居住。在仰韶文化时期，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原始水井两眼，是人类利用地下水的创举。夏县西阴和万荣荆村、芮城东庄等遗址出土的人们汲水使用的尖底瓶，是人们取水方面的一大发明。春秋战国时期，凿井在河东已经大量推广，从出土的陪葬冥器中的陶井、贮水用的陶瓮、提水用的陶罐及饮水用的陶碗等，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劳动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方面与大自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人们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征服抵御自然的能力，历代水旱等诸多灾害，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把这些史实铭记在心，载诸史册，刻之于石，这就是现存于城乡各地的水利碑刻。

河东旧辖蒲、解、绛三州，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碑刻荟萃，名冠山右，素有“三晋碑乡”之称，其中尤以水利石刻为盛。但由于代远年湮，兵燹沦毁，灾异频生，多数石刻已遭损毁，不存于世，有些幸存者亦剥泐漫漶或成残石断碣，其完好者不到十分之一。运城市石刻研究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至今，在本市境内共搜集、拓印、收藏到水利石刻约 300 余通。上起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 35 年），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时间跨度达近两千年之久，其价值弥足珍贵，为研究河东水利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水是人类生存之本，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为了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以古为鉴”，对河东水利石刻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实施和小康社会的实现。



(二)

河东，西、南襟带大河，南、北中条、吕梁两山对峙，中有汾、涑二水横贯其间，以此山川、地貌之特点，形成了运城盆地（或称“涑水盆地”）、黄河谷地、汾河谷地。黄河滚滚北来，山泉潺潺流出，汾、涑二水，奔流不息。早在唐虞之际，洚水横流，民无定居，禹承舜命，随山刊石，导河浚川，先民得土而安。春秋末期，鲁之穷士猗顿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凭借着这片西抵桑泉、东跨盐湖的百里沼泽，水便草丰，以牧致富。昔时永济之张扬湖，景色如画，水波荡漾，舟楫往来，鱼游穿梭。后来的河东地区的确是一个沟渠纵横，陂塘满目，水源充裕的好地方。农业发达，盛产粮棉，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黄河，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哺育了华夏儿女，生息繁衍，传宗接代，人们以亲切的语言把它称作母亲。黄河在河东流经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垣曲八县市，沿河形胜壮观，景色宜人，名刹古迹，星罗棋布。自古帝王贤相巡幸祭祀，文人骚客游览观光。挥翰濡墨，辞章连篇。名碑巨碣，俯拾即是。这些都纪录了黄河历史的变迁和泽润士民的功绩。

龙门，《水经注》曰：“山壁立千仞，夹岸通河流，形如门阙。”传说：因禹所凿，故又称“禹门”。《禹贡》所谓导河积石之地。这里山光水色，景色绝妙，久为人们向往。明吕楠《龙门山记》云：“万山之谷，形势甲宇内，久怀游览而未获……天下之美，不努力一至，即为缺事，况此禹迹乎？”旧时，龙门禹庙，建筑宏伟，碑石林立，今已庙毁碑亡，遗迹难觅。仅存寥寥数通碑刻，可资鉴赏。明线刻《古耿龙门全图》上有薛瑄《龙门八景诗》，诗中“桃浪三级”，形象的描绘“鱼跃龙门”的景象。诗云：“星河一泻势如倾，春暖桃花浪几层。嘱咐鳣鱼休点额，峥嵘头角任飞腾。”河东博物馆藏有浮雕《龙门全图》刻石，一连五石，构思完美，镌艺精湛，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出“峭壁立千仞，夹岸通河流，极目皆洪水，高泻自天来”的龙门形胜。此景与半山鳞次栉比的禹庙建筑，折



概 述

旋八十曲的蹬道，相互衬映，构成一副绝妙的艺术佳作。河津市博物馆尚存清·吴用光《题禹门诗》刻石，诗曰：“谁向昆仑溯厥来，青峰对立疑天开。吞吐江海乾坤撼，劈破鸿濛鱼飞台。临流远眺苍无际，漫夸子云能赋才。”此诗概括描绘出黄河流经龙门峡谷时震古烁今的壮观景象。

荣河，古汾阴地。《水经注》曰：“汾阴县城西隅曰‘睢丘’，丘上有后土祠。”汉武帝曾六次巡幸于此，祭祀后土。《纲目》载：元狩三年（前 120 年）得神马于渥洼中。清康熙版《荣河县志·祠祀》条载：“白马庙在县南十一里赵村北，世传龙马负图出河于此，汉武帝建庙以祀之。”二十世纪末，笔者在荣河镇某居民家访得《龙马负图处》刻石，上款题：赐进士文林郎知荣河县事山东鄆城侯祁题；下款题：“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冬十月。”李郢《上裴晋公诗》曰：“四朝忧国鬓成丝，龙马精神海河姿。”极言马之精神健壮。龙马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黄河儿女，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创造着人类文明。祠内秋风楼上竖有汉武帝作《秋风辞》刻石两通（一为元代，一为清代）。跋云：“汉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东祀后土，宴饮中流，欢甚作此。”从辞句中可知，时值金秋季节，秋风萧瑟，鸿雁南归，帝乘楼船荡游于汾河之中，在乐极时，感叹人生易逝，即兴作辞，以赋情怀。辞中还体现出当时汾黄交汇处的水土环境和秋风楼的三次东迁，说明自元以后水土环境在日趋恶化。

河水由汾阴流经临晋至蒲坂。蒲坂，舜都也。志载：河患频仍，不时东徙，蒲城岌岌可危。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御驾蒲州，驻跸蒲津，亲视水患涨溢入城，忧心民难，遂御书《砥柱河津》四字，榜悬于河渎庙殿，守臣宸翰于石。1988 年巨碑出土，重现于世，现藏永济市博物馆内。此碑是蒲州城屡遭水患城倾殆尽的历史见证。

平陆，古虞国地，汉改大阳县，《地理志》曰：“北虢也。”该县圣人洞有傅说庙，庙内存碑十余通，原有唐大曆四年（769）侍御史杨麟撰《傅岩庙碑》，今已不存，仅存者有金大定、明嘉靖、万曆



及清代关于傅说版筑事迹和建庙修庙崇祀始末等碑。据考，殷商时期，涧水暴涨，道路被毁，行旅艰难，傅说带领胥靡刑人治理，发明了版筑营造技术，根绝了水患，便利了交通，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是我国水利、交通史上的一大贡献。后又辅弼武丁，中兴商代，成为历史上一位由奴隶成为宰相的政治家。

三门，《平陆县志·山川》载：三门山在县东五十里黄河中。《纲目·质实》曰：“山有三门，禹凿以通，南曰鬼门，中曰神门，北曰人门，故谓之‘三门集津’。”三门山上有禹庙，建于唐天宝间，规模宏大，名闻晋、秦、豫三省，现仅存残垣断壁。庙内曾竖有明天顺二年《重修大禹庙碑》，万曆二年《三门官厅碑记》，正德十六年闵槐《游三门诗碑》以及清代的石碑数十通，惜已随庙而毁。县志载：“砥柱峰在三门东迤南黄河中流，高数仞，石形如柱”，人称“砥柱峰”。历代颂砥柱的诗辞铭刻颇多。《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十二年）二月乙卯，车驾还京。癸亥，观砥柱，勒铭以纪功德。”唐柳公权曾撰有“砥柱铭”，久已湮没。惟明·西京焦源溥题《砥柱篇》刻石，石已佚亡，但国家图书馆尚存有拓本，共七石。全诗二百余字。诗曰：“洪河龙门来，奔崩华山趾。谁能系飞流，疾如弦激矢。……踏足望楼头，历历见星嵬。一壁四削成，的的芙蓉蕊。”描绘出黄河奔流的奇观和冲击砥柱惊险绝妙的景象。近年来在平陆环河公路旁发现了明崇祯巡抚山西监察御史余城题《中流砥柱》刻石，文仅有四字，但意蕴深长，它不仅赞颂了独立于黄河惊涛骇浪之中的砥柱峰，不震不摇，天造地设，遏制水势的威武形象，而且意寓世人要像砥柱一样，独立不惧，富贵不淫，权宠不覬，威武不屈的高尚品格，显示出中华儿女坚强不屈主宰黄河的精神。

黄河漕运是黄河对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上世纪末，小浪底水库淹没区文物普查时，在平陆、夏县、垣曲黄河古栈道摩崖发现题刻十余处。其中垣曲县五福洞村有三处：一为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十二月，遣匠师千人专治……百处积临池水



概 述

滩……。此题刻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黄河漕运的石刻，在全国亦属稀有；一为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岐州郿县令侯懿等奉敕造船四艘，试航三门；一为明崇祯年间的“去思碑”，文中记载从崇祯七年至十一年间，县令段自宏等官员防河打冰至此。另外在平陆县三门乡寨后村还发现唐总章三年（公元670年）“奉敕开凿三门河道记”。在老鸦石发现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赵金龙等题记；垣曲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曲沃朱大忠押茶纲大将王佐题名”；夏县任家堆“密院劄子”及北宋治平、绍圣，清道光、宣统间题记、题名、题字。黄河漕运为当时京师物资供给和朝廷政权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题刻是从汉至清黄河漕运的历史见证，颇有研究价值。

汾河流经河东之新绛、稷山、河津，于荣河镇汾阴后土祠而入黄，民赖其利者已久远矣！汉代河东太守番系曾穿渠引汾以溉皮氏、汾阴之滩田数千顷。自明、清后，则灾害频频，民受其苦。汾河沿岸水利石刻遗存鲜有，仅见新绛清顺治十年（1653）《重修石岸并南门记》，据碑文载：“客岁，汾河滔滔，漂流万家，城门颓圮，岸□崩毁……单使君奉天子命来牧兹土……即询父母，察灾伤……寻其故道，理其陈迹。……今岁河水数至，而（□……）赖时乃功也。唯时绛百姓感恩佩德……公之功不在禹下。”

涑水，源于绛县陈村峪，经原闻喜、夏县、安邑、猗氏、临晋，入张阳池（伍姓湖），汇于黄。记载涑水碑刻传世罕有。今在闻喜县元家村宋氏宗祠内发现墙壁嵌砌有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李汝重刻《涑水渠图说》线刻碑。碑之上部刻绘涑水由发源地流经闻喜以东县境的实况图，其下部记载“按涑水发源绛县横岭关烟庄后，至本县义宁里乔寺北地方，截河堵堰……”此系水规文契，很有史料价值。明弘治十七年（1504）《修涑水河记》，清顺治十年（1653）《浚筑涑水崔家湾记》，皆因屡屡盐害而障水西流，以挽南倒之波，免破决之患，保盐花勃勃，其功不可没。

泉水是水利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河东地区南、北两山及



高原、丘陵峡谷之间，多有泉水涌出，大者若环，小者如线。虽涓涓细流，却清澈见底，甘甜爽口，既可供人畜饮用，又可利用溉田。芮城县五龙庙唐大和六年(832)《龙泉记》碑载：“城西北隅有泉，其窦如线，派分四流，浇灌百里，活芮之民，斯水之功也。”新绛古堆泉，源出九原山，宋嘉祐元年(1056)宋司马光撰文《鼓堆泉记》赞曰：“水极清洁，洞鉴毛发，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淫雨不溢。”此水有“清明之性，温厚之德，常一之操，润泽之功”。异他水所灌也。清乔宇《游鼓堆记略》载：“泉发于鼓山，高圆如鼓，则泉以形似而名。泉上有堆如覆釜，行履之上如鼓，则泉以声似而名。……土人以天河名之。”溉田于平畴低野，利民者久矣！河津的《三峪渠道碑图》，详细绘制出泉源、渠道以及流经村庄、寺庙、分水闸口等。此图是三峪泉水权属的依据。原万泉县孤山东南隅“风伯雨师”祠右有泉二，源于山之上下，名曰“双泉”，碑云：“质不在天，地不在显，今涓涓之水，不盈涧壑”，老圃灌畦，且可饮数千户。

泉水美化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绛守居园池记》碑云：“引余水入城内官衙后，蓄为池沼，池上建洄莲亭，两旁广植竹木花柳，垒台榭，园内盛设亭台楼阁，建筑秀丽，假山耸峙，清水环绕，花卉争艳，白松荫地，古柏参天，曲径小桥，景色优美。”欧阳修、范仲淹等名流学者曾闲步其间，吟诗作赋，留有诗刻。明李文浩手书“动与天游”石额，是描写洄莲亭映入水中，在荷花盛开季节，微风吹来，水波荡漾，映入水中的蓝天白云与四根石柱连亭一起，左右摇摆，恰“似与天同游”。这座冠我国北方园林之祖的园池，虽曾颓为瓦砾，目不复睹，但此碑文与“动与天游”石匾，却是这座古老园池的历史见证。近年随着古绛历史名城的开发，绛守居园池经过重新修葺，已焕然一新，游人纷至。

昔日，河东地区湖泊、沼泽居多：盐湖、伍姓湖、鸭子池、女盐池、五小池……星罗棋布。盐湖，古称鹾海，是个典型的封闭式内流湖泊，盛产潞盐，自然天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在池神庙内碑林，保存有七十余通碑刻，记述着河东盐池历代修渠堰、防



概 述

水患、建垣堑、祀水神的千年历程。清人胡聘之谓：“紫谷柳泉场，见度支之刻，银河雪苑诗，留学士之题；颂灵庆之堂，赋逾百万，城圣惠之镇，社萃四千；姚相驰车，流潦败则天之世；王千起堰，兴盐复大观之朝。千井为沟，笼解梁而绕安邑，万商所辏，冠秦魏而明河汾；永泽资宝之封，实加完泽，淡神风庙之额，爰赐崇宁。则可考盐法者六也”。其价值不言而喻。永济伍姓湖（又名张扬池或西陂）有着广阔的利用和开发的前景。清乾隆十九年（1754）牛运震撰《游五姓湖》碑云：“斯湖汇永济、临晋、虞乡三县之交，南浸中条之麓，北接桑泉，东受姚暹渠、鸭子池诸水，西抵赵伊镇输入涑水，周环六十七里。五老诸峰倒影其中，孤山、峨嵋冈，远空涵翠，复映带之。清乾隆二十年（1755）周景柱撰《五姓湖记》碑曰：“前时环陂皆楼阁亭馆，杂树李桃，丹绮照耀，酒帘歌筝。游人簇集，波光渺瀰，吞映云日，烟艇往来，泛狎鸥鹭，光景良胜”。把伍姓湖的宜人景色，描摹得绘声绘色。今该湖久涸复生，经过近年修浚、疏导，开发利用，既得鱼米之利，又辟为观光之所，与五老峰、王官峪组成一个以山水为主题的自然风光旅游区，其何乐乎！

泉水虽非江河海洋，但微寸之流，如线之派，给人民造福非浅，正如《广仁王龙泉记》中所云：“自微可以观著，由细可以迹大者，其唯龙泉乎！”故泉湖之水虽小而利大矣！

凿井取水，浚池蓄水，系先民们远离河流、湖泊，聚处定居，繁衍生息，利用地下水源的一大进步。上古时的虞国（今平陆）就有“伯益作井”之说。夏县东下冯古遗址发现的原始古井，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凿井事例。春秋战国时期凿井在河东已普遍推广，从出土的大量冥器陶井模型，足以证明凿井取水由来久矣。据《平阳府志》载：“万泉止数井，民用不给，取给涧水。其馀村落中井不过三，甚有村无井者，则蓄雨雪以供用，或远汲他地，动逾三十里，盖地以穿井为艰，深者百丈，浅者亦八、九十丈，且穿一井，其费既多，甚有穿之至深终不得泉者，是以井少，人尤苦之。”这些地区在平常年景，风调雨顺，家给人足；干旱之年，人畜饮水



全靠井池蓄水，庄稼歉收，人民难以维生，故有穿井取水和挖池聚水的传统习惯。近年在稷山县化峪镇南位村发现有打井碑十通之多，这是山区靠井而生的典型事例。明嘉靖七年(1528)《万泉县凿井记》载：“以万泉名，虽因东谷多泉，实志水少也。城故无井，率积雨雪为蓄水。计以罂瓶、盎桶，取汲他所，往返动辄数十里。……千百年中，殆不知其几掘也，卒不可得泉”。嘉靖廿年(1541年)御史穆伯寅视临其处，怜民苦，忧水缺，倡其事，不逾月而井成，井深“仅二、三十丈而已，且清冽而甘，甲于他井。”清咸丰十年(1860)《解店凿井记》碑：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食贵有余，所饮者何可不足哉！……合巷等议凿新井，人皆乐从。”于是按人、地、畜，集资捐银，择日兴工，不日告竣。今者，甘泉涌出，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此例对当今仍有借鉴之处。平陆县清光绪十二年(1886)《疏浚池塘记》碑载：“盖前人凿池聚水，其虑远矣。庄南门内，旧有水池，东南磊石为岸，西北注土为岸，周围数十丈。村人饮牛马于斯，浣衣服于斯，筑墙泡土取水亦于斯。……幸而功成，甘霖日降，池水盈盈。是功也，不独小有益于后事，而且大有补于风脉。”临猗县好义村有一通《重修池波碑记》曰：“余村旧有池波……迄今数百余年，而人文蔚起，户口繁衍。……但年湮代远，池岸多有损伤，久欲补修……爰聚东西北三甲人等，商议重修，庶乎！焕然一新，以继前人之志，以壮一村之威也。”

值得一提的是明万曆四十五年(1617)垣曲县《重修舜井双池记》碑，除歌颂大舜孝德和侯令功绩外，碑文着重论述了科学用水的道理。此水“出于幽深，至为寒沴，引于沟洫，难为禾稼。……考其水历千载如一日，而吾民近圣人之居，不被圣人之泽，以未调其水之性耳。水之一性寒，舜之井根于九地，澈于重泉，尤其至寒者，可无曲回一转移之，令其委和，可资灌溉”。于是创修池塘递引井水十余里，果然提高了水温，利于灌溉，二麦勃兴矣！故在十七世纪初，能撰写出符合现代科学道理的碑文，实属难能可贵。



概 述

凿井、浚池是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寻找水源的实践经验。高原丘陵地区应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以备水荒。历代人民把凿井、浚池作为义事一宗，慷慨捐银，芳名永存。

(三)

加强管理，制订水规是利用水资源的重大举措。历代官方对水的使用都有制定的法规，民间亦有经过协商制定的水规民约，并刻之于石，俾众周知。这对争讼者以明断，违犯者以严惩，有所依据。此类碑刻，遗存较多，不再赘述。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具控捏命夺水案碑》系解决新绛、稷山关于马壁峪涧水利用纠纷之判决书。清嘉庆九年(1804)《为断明水利合村人等焚顶叩恩碑》系解决稷山县黄花峪利用洪水发生矛盾之判决书；河津之《白公断案碑》、《海公断案碑》等，是解决三峪水利纠葛的判决书；《鸡心滩记》是山西永济与陕西朝邑(今为大荔)为滩地纠葛而制定的协议书。所有这些都对平息纠纷起到化解作用。在审断过程中，一些官员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置，芮城县《南冯里护渠案碑》在肯定沿渠插柳妨害水利的同时，又视当时为溽暑季节，移树必死，则待来春移之。这样既保护了水渠免受侵害，又能保证大树的成活，合理，合法，合情，当事双方都很满意。

为使各方有规可依，当年都制定了一些合理可行的办法。《河津县水利榜文》和《三峪水规碑》系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三峪灌区十六村制定的上缴粮则、轮番浇地的法规。使其按地分水，按水平粮，清浊有别，不容紊乱。用水之村，依序轮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明嘉靖年间竖立的张与行《绛州北关水利记》是对古堆泉水的重新番牌，并赞扬张公仁爱情怀，处事高明的方法。另外《续鲁晋峪乡水碑记》、《上下登板潭家沟三村水规碑》、《王官峪五社八村水规碑》等都是公正合理的水规民约，有的至今百余年仍发挥着作用。

(四)

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以极大的威胁，甚至给人



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前人为记其事，多刻石以志。河东历代灾异又以干旱为甚，故有“十年九旱”之说。明、清年间的几场大旱，实属罕见。

闻喜县清顺治五年(1648)《闲事碑》载：“崇祯四、五、六年，流寇犯乱，抢夺财物，杀掳男女，焚民房屋，不知其数。及七、八、九年，荒旱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子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究至为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民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人中之数，十中去七。似此景象，百姓之疾苦，古来罕有。”古云“五谷不升谓之大祲”。清光绪初年，三年不雨，赤地千里，夏秋不收，晋省成七十余州县，被灾尤甚，并有石刻为记。《杜村灾情碑》载：“尝思天灾流行，何代蔑有？所重者莫如光绪之三四年耳。”秋田全无，麦未下种，至四年二、三月，麦米大长，每斗三十斤，价银三两七八。人无度用，抱食草根，草根吃尽，刮吃树皮。道路中饿殍累累，田野涧青草濯濯。八口之家，死已过半，十室之邑，生则二、三。旱久而宽，无处可逃，实有吃人肉而炊白骨者，甚有食儿女者。”该县南火上《灾年记》碑云：“人弃其子，夫撇其妻，至性之恩，情不暇顾……八口之家，亡其六七，十室之邑，仅留二三。”盐湖区《悲灾荒歌》碑云：“东邻吃了儿和女，西邻吃了自房妻，南邻吃了亲父母，北邻吃了胞兄弟。”平陆县《灾年后掩藏暴骨记碑》记载尤详：“米粮价高五、六两，无钱难籴升合之粮。沃壤值钱百馀文，数亩略充一夕之饱。饲畜之户，卖牛羊，宰鸡犬，聊裹饥肠。缺供养之家，剥树皮，挖草根，苟延性命。首饰重金玉，货变时轻若泥沙。器物总精良，售卖者只做柴草。”“见暴露之骨，拾聚一处，掘穴掩藏，积土成塚，遂以此方为义地，觅工刊石，永垂千秋”。闻喜县《十八堰村灾荒碑》记载有一组数字：“全村有户五十，人一百八十八口”，“秋收后计存户仅十七家，人五十五口。”此场灾难，难以尽述，盖因缺水所致。历史告诫今人，要以史为鉴，树立长期防旱抗灾意识，不能让历史重演。

水既有灌溉之利，亦有泛滥之害，利害并存。据万荣后土祠